

大仰韶：一个世纪的考古探索

王仁湘

仰韶文化是中国田野考古最早发现和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

揭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去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考古调查的时间，是1921年4月。他在村边冲沟的崖壁上发现了远古时代的文化堆积，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片，包括一些绘有红色或黑色图案的彩陶片。他判断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后，于这一年的10月至12月在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参与这次发掘的有包括袁复礼在内的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5名工作人员，他们共发掘了17个地点，获得了大批珍贵文化遗物。

考古队在发掘仰韶村遗址之后，又在渑池西庄村、不召寨和杨河，以及蒙阳王寨、池沟寨和牛峪等地点进行了调查或发掘。后将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这些同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因为这类遗存均以彩陶为明显特征，又称为“彩陶文化”。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揭开了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没有仰韶村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的时间可能还会晚一些，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建构或许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完成，“仰韶”这个名字也不会出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史前时代的中国，是从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开始的，仰韶村应当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祥地”而载入中国考古学史。

中国生命力最强的考古学文化

一个世纪中，中国考古学家开展了许多次大范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仰韶文化及受仰韶文化明显影响的遗址发现数以千计，分布以陕西、河南、山西为中心，影响则远达青海、湖北、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区。

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仰韶文化的研究经历了百年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深入、成熟、提高、升华等阶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深入认知的研究阶段。前期以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的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为重要标志。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首次发现了彩陶、黑陶、灰陶所代表的仰韶、龙山与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表了题为《小屯、龙山与仰韶》的重要论文。后来考古学家尹达非常明确地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遗存，龙山文化是晚于仰韶文化的另一体系的文化。在田野发掘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由认知龙山文化而进一步了解仰韶文化，并且确认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确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主要文化体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进行大规模发掘和



图①：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
图②：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
图③：仰韶鹳鱼石斧彩陶缸。
图④：双槐树遗址的大型版筑遗迹局部。

王仁湘供图
版式设计：赵德汝

全面研究的成熟期，以西安半坡和陕县（今陕州区）庙底沟等一系列大型遗址的发掘为重要标志。半坡和庙底沟两个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两个主要类型，更加明确了仰韶文化的面貌。调查和发掘遗址数量大大增加，仰韶文化的地区与时代特征渐渐分明，类型和分期研究成为研究者们的重要课题。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确认，找到了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证据。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专题研究蓬勃开展，探源研究成果显著提高期。这一时期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临潼姜寨和郑州大河村等，为探索仰韶文化渊源而发掘的重要遗址主要有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武安磁山和新郑裴李岗等，此外还有宝鸡北首岭的补充发掘。

在这一研究阶段获得了大批碳14年代数据，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研究成为现实。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聚落形态、农业起源、生产工具、制陶工艺、彩陶、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源流等专题研究增加。通过多角度的全面深入研究，仰韶文化在分区、分期、类型、源流、墓葬制度、聚落形态、人类体质形态和文化关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开启中原史前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的考古与研究，在沉寂了许多年之后，进入本世纪以来有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随之也引出研究者的不少新思考，新的学

术动向又唤起了人们关注的热情，可以称之为升华期。

202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确认是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遗址带有三重环壕，核心区是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组成宫城性质的居住区，附近是深厚夯土筑成的大型广场。在郑州青台遗址发现环壕4条，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作坊区划分明确。

仰韶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表现在对豫晋陕交界三门峡地区新石器遗址开展全面调查，一些重点发掘收获非常丰富。

河南黄河南岸与渑池相邻的灵宝一带，地处豫陕晋交界，被认为是中期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聚落分布密集，文化内涵丰富。既发现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也有四五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常见的是20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以及10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呈现为多层级区域聚落结构。

大型聚落内部也有分化。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房址、100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组合在一起。而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组合，小型简陋房址则与小墓甚至灰坑乱葬相邻。如西坡遗址大墓出土玉器、象牙器等高等级随葬品，最大的房址外带回廊，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是考古发现的中国史前最大单体建筑，分析可能有高耸的重檐大屋顶，建筑具有殿堂性质。

河南郑州以西至河洛地区，也是仰韶中晚期文化十分重要的分布区。大型中心性聚落呈集群式分布，聚落规模庞大，一般达数十万平方米，有两三周环壕，是中原出现的最早一批城址。郑州大河村遗址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在地面上的连间套房并排相连。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版筑城垣在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在陕西高陵杨官寨发现了面积80余万平方米仰韶中晚期聚落，有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和制陶作坊区，这是关中地区少有的新发现。

近些年发现的大型仰韶聚落，已经足以让我们重新评价仰韶的社会进程。新的发现，仍然可以期待。我们在许多地点已经发现了诸多庙底沟文化大房址，面积可以大到200多甚至是500多平方米，可是至今却没有见到与之匹配的大型墓葬。设想有一天发现了这样的墓葬，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高度才可能得到更全面的揭示。

文明的出现，经过了漫长的孕育过程，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导致邦国建立，中心城市出现，宏大的治水工程付诸实施，初级国家管理机构出现；最后发明文字，发明冶金术，人类终于走出混沌，文明诞生，国家出现。依据现在所获得的考古资料，研究者认为在仰韶中晚期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现象，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图为德化窑青白釉小盒。

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是元朝泉州的德化白瓷，目前依然存放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内。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的“乳白似象牙”的“中国白”，则是法国人对明代中晚期德化窑烧制的白瓷的专有称谓。

中国瓷器大规模外销始于唐、五代时期，主要为越窑、长沙窑、巩县窑、邢窑产品。宋元时期，随着海上航路的拓展，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北方的磁州窑、定窑、耀州窑，南方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名窑产品都有外销，但多数窑口距离海港路途遥远，运输成本以及损耗率居高不下，难成规模。而泉州所管辖的德化、晋江、南安等地区，多山临海，林木茂密，溪流纵横，瓷土资源丰富，水陆交通通达，具备制瓷手工业发展的所有必要条件。为满足海外市场对外销瓷器的巨大需求，宋元时期泉州所管辖的地方开始设置大量仿烧越窑、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专供外销。

构成泉州港这一世界遗产的22处遗址中，德化窑的屈斗宫遗址和尾林一内坂遗址位列其中，它们正是泉州宋元时期海洋贸易的主要产品瓷器生产的杰出代表。

屈斗宫窑址位于德化县龙浔镇，由福建省博物院联合厦门大学、原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于1976年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发掘出分室龙窑一座，填补了德化窑发展历史的一个空白，是研究中国古代南方窑炉技术体系重要的考古资料之一。分室龙窑在当地称为“鸡笼窑”，是龙窑向阶级窑过渡类型，具有容易控制火焰气氛、节约燃料等特点。所发掘出土器物标本近7000件，皆为宋元时期的白釉和青白釉器，胎质洁白精致，白釉细腻温润，青白釉呈水青色，釉厚处呈淡绿色，玻璃质感强。

尾林一内坂窑址位于德化县三班镇。2020年3月至6月，福建省博物院联合德化县陶瓷博物馆、厦门大学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有5座窑炉遗迹，出土宋至清代青白瓷、白瓷、青花瓷标本数千件。尤其是首次在一个遗址中发现四座分属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窑址，对应着从龙窑至明清时期的横式阶级窑的发展演变过程，填补了德化窑古代窑业技术史的缺环。

考古人在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广东“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东南亚等地均发现大量德化窑产品，也从侧面证明德化窑瓷器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商品之一。

明代中晚期，随着制瓷和窑炉技术的改进，德化窑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创造出胎釉浑然一体、釉色如脂似玉的白瓷制品。其中的佛道人物塑像，代表着德化窑的最高制瓷水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座德化窑白釉观音坐像，神态安详自然，衣饰巾垂拂流转，栩栩如生，望之顿生庄严谦卑之感。

至清代，德化窑除继续生产白瓷外，还根据海内外市场需求，生产青花瓷和彩瓷，且青花瓷渐成主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德化窑从一开始的自给自足模式到宋元时期为了适应海外市场需求而进行主动调整，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重要陶瓷生产基地。明清两代又因海禁等原因，转为“内外销并重”的生产和销售模式。

德化窑瓷对海外世界的影响时间长、范围广。在欧洲，德化瓷引发了当地的厨房革命，所生产的杯、碗等，替代了原有的金属餐具，甚至引发了仿制德化瓷的热潮。后来，欧洲发明的第一件硬质瓷，模仿的样本就是中国德化白瓷。

德化瓷器行销天下

王 澜

河西画像砖上的风物

李重蓉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图画众生——河西画像砖上的古人生活”展，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了河西走廊地区魏晋时期的258件（套）彩绘画像砖及相关文物。画像砖涵盖了甘肃省至上至省级、下至市县级多个博物馆的精品，上承汉代画像砖石的艺术风格，造型鲜活，题材丰富，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翩然拂动：魏晋人的服饰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的一块画像砖，摹绘了宗族听讼的一幕。砖面上方绘红色帷幔，帷幔下绘小几，装饰厅堂。画中有三人，正中间是宗长，头戴纳鞞的高冠，着交领长袍，拱手端坐，头偏向一方，正凝神听取跪在画面左侧一人的禀报；画面右侧，立有一名戴介帻、着袍的人。冠下衬帻大约从东汉开始流行。袍在先秦时指内衣，到东汉已用作外衣，其形制特点是上衣、下裳相连，交领、宽袖，逐渐取代了战国流行的深衣，上下阶层皆可穿着。

当时女子多以襦配裙。一块高台县博物馆藏画像砖，画面中间绘一棵繁茂桑树，树下左右各立一女子在采桑。左侧女子上半身微向后仰，着红色襦衣，右臂下垂，手持桑笮，左臂向上扬，攀住桑枝正在采叶；下着白裙，露出履尖。右侧女子则着白色襦衣，右手持桑钩采桑，左手提桑笮；下着红白条纹相间的裙子，也露出履尖。两名女子的宽袖与裙摆随其劳作而翩然拂动，展现出微风中的自然动态，颇有魏晋时期绘画的特色。

庖厨美饌：魏晋人的饮食

魏晋庖厨画像砖的内容，大致可分作宰牲、



汲水、炊煮与切菜几种。

烤肉串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习俗，有学者考证它最近自西汉初传入中原本土。一块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藏画像砖，描绘了仆人呈奉烤肉串给主人的画面。主人位于画面右方，坐于榻上，戴帻着袍，右手持便面（遮面的扇子），榻前置盘以放肉串；其左右分别有朱色榜题“幼洁”“段清”，可能分别为其表字与名字。仆人则位于画面的左方，头戴尖顶帽，左手举一支串满烤肉条的“三叉戟”进奉给主人，肉香扑鼻。主人持便面，既为当时流行习俗，也为驱散烤肉

的烟火以便食用。

闭门成市：魏晋人的住房

庭院是汉代画像砖石上常见的建筑题材，也为魏晋画像砖所延续。如一块高台县博物馆藏庭院画像砖，砖面正中绘一门户，殿殿顶，双门扉，门内应为庭院；门的右侧立有一人，似为守卫，门的左侧则为庖厨。这是传统的庭院生活场景。

当时具有特色的建筑是坞壁。东汉地方豪强势力急速发展，广泛兼并土地，荫庇宗族与宾

客，形成自己的武装与生产力量，逐渐出现了坞、屯、壁、堡、垒、营、寨等集生产、生活、军事为一体的建筑，闭门成市，它们在魏晋时期发扬光大。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藏一块画像砖，砖面左侧绘一小城，城墙上筑雉堞，城门上建雉楼，榜题“坞”字。坞外绘有两株树，还有一群牛马羊在悠闲吃草，形象再现了坞的建筑形制。

载驱载驰：魏晋人的出行

一块高台县博物馆藏的出行画像砖（见左图）格外传神。该砖原位于高台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前室南壁，与其他6块砖连贯组合，每块砖绘制2—5人不等，如此7块砖共同构成一幅长卷式的出行图，横贯墓室的三壁，反映了墓主人出行队伍的宏大与威仪。这块砖位于长队队尾，绘有5人各骑红、黑、白色的马向右疾驰，前方有三骑并驾齐驱，后两骑则一人牵猎犬、一人架鹰，紧随其后。五马鬃毛飞扬，尾巴向后飞扬，飘出潇洒的弧度，以此显示出狩猎的风与行进的急速，细节生动。高台县博物馆藏另一块画像砖，绘制了马车的形制。马车位于该砖中间，车厢掩闭，应为农车的一种；拉车的白马在前飞奔，旁有一御夫；主人端坐于车厢内，身子微向前倾；车后跟随者仆从。

牛车也是当时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如高台县博物馆藏一辆东汉彩绘木牛车，牛在前俯首拉车，车制作机巧，由双轭、车舆、帷盖及车轮组成，车舆前后各有两引可开合的车门，门框涂褐底黑点，车轴、轮辋及帷盖涂黑色，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们通过画像砖，能够看到河西走廊地区安定的社会生产环境和魏晋人的衣食住行。内容丰富的魏晋画像砖也展示了那段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风情。当时的一些风物与习俗，在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之后，至今仍流传，显示了我们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